

STUDIES ON THE MONGOL - YUAN
AND CHINA'S BORDERING AREA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

集刊

(第三十一辑)

刘迎胜 / 主编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 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2016—2017)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

集刊

(第三十一辑)

刘迎胜/主编

高荣盛 华涛 姚大力/副主编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第三十一辑 / 刘迎胜
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325-8145-0

I. ①元…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元代—丛刊②边疆地区—民族历史—研究—中国—丛刊 IV.
①K247.07-55②K2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0041 号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第三十一辑)

刘迎胜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25 插页 4 字数 398,000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8145-0

K · 2221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邱树森(暨南大学)

陈得芝(南京大学)

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蔡美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编:

刘迎胜(南京大学)

副主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华涛(南京大学)

高荣盛(南京大学)

姚大力(复旦大学)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铁(云南大学)

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

华涛(南京大学)

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大学)

杨晓春(南京大学)

张云(中国藏学中心)

郝苏民(西北民族大学)

特木勒(南京大学)

黄晓峰(澳门文化杂志)

方骏(加拿大呼伦大学)

达力扎布(中央民族大学)

刘迎胜(南京大学)

李治安(南开大学)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

姚大力(复旦大学)

高荣盛(南京大学)

英文校对:

何启龙(香港东华学院)

执行编辑:

杨晓春(南京大学)

于磊(南京大学)

目 录

《元史》会注考证

《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会注考证(上)	杨晓春(1)
----------------------------	--------

元史研究

名开榷场,实修堡垒——宋元襄樊战役元军筑堡年代考	洪学东(39)
元代阿速卫研究两则	蔡晶晶(46)
论元代的人口籍没	乔志勇(54)
1324—1332年陕西行省特大旱灾探究	张瑞霞 葛昊福(67)
成吉思汗宣差刘仲禄生平拾遗	黄太勇(80)
高丽文臣李齐贤元代江南之行	郑叶凡 乌云高娃(87)
《马可·波罗行纪》与高丽史料对勘三则	舒 健(98)

海疆与海洋活动史研究

中国帆船による東アジア海域交流	松浦章(106)
中国帆船与东亚海域交流	(日)松浦章撰 杨 蕾译(123)
《元史·日本传》会注	于 磊(138)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南洋地名的五个系统	周运中(160)
安南莫朝范子仪之乱与中越关系	叶少飞(17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海运业	杨 蕾(185)

民族、宗教与边疆研究

关于清初蒙古伊苏特部	N. 哈斯巴根(195)
清末新疆学堂教育行政机构研究	王启明(202)
心战与兵战:谈作为“治边经验”的“七擒七纵”	刘砚月(211)

读书札记

《元史·刘宣传》勘误一则	常 莹(218)
--------------------	----------

译 文

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先世的六世系

.....(美)艾骜德(Christopher P. Atwood)撰 罗 玮 译(221)

乌珠穆沁某些民间故事的历史根源

——关于民间故事和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乌云毕力格 撰 曹金成 译(265)

《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会注考证(上)

杨晓春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三十、府一、州二,属州二十六,属县一百四十三。^[1]本省陆站一百八十处,水站八十二处。^[2]

[1] 李金铭《〈元史·地理志〉州县数字的舛误及影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指出:根据《地理志》实际列举的统计,江浙行省共有县一百四十四,《地理志》概述部分少算一个。拿《元一统志》和《元史·地理志》互相补充进行核算,也可得出一百四十四县之数。

[2] 江浙行省陆站、水站情况,可参《永乐大典》引《经世大典》残卷及《析津志·天下站名》,尤其是前者。前者所载为各路下站赤的具体情况,后者所载为驿道的情况。按《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二“站”字“站赤”引《经世大典》: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二百六十二处。马站一百三十四处,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轿站三十五处,轿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一处,递运夫三千三十二户。水站八十二处,船一千六百二十七只。(中华书局影印线装本第一百四十七册,第十四叶)

《地理志》所载数量与之完全相同。按《大元一统志》不载驿站情况,《元史·地理志》有关各行省驿站的总体状况,当即从《经世大典》而来。又可知《地理志》所谓陆站指马站、轿站、步站三者而言。

《元史》卷一百一《兵志四·站赤》所载江浙行省站赤数量同《经世大典》。(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592页)

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1]

[1] 《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载:国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至元十三年,罢按察司。十四年复置,增立八道,其中有江南浙西道。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肃政廉访司。(第2180页)又《南台备要》“八道按察司道分”条载:“江南浙西道,临安府置司。”(《宪台通纪(外三种)》,王晓欣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可知治所在杭州。“临安府”问题,参见后文。

方回撰《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题名记》曰:“至元二十八年春更化,夏,诸道提刑按察司更名曰肃政廉访司。……司置使二人、副二人、佥事四人,以分司一员,监临各路。三十年春正月,中奉大夫、大使东平徐公尝任中司,参大政,自吴门移治于杭,以总各路分司之

政,书司官姓名于石,后之览者,将因名以求其实云。”([元]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697—698页)中司即御史台下设之殿中司,东平徐公即徐琰。徐琰撰《文正公祠记》开篇曰:“至元壬辰(二十九年),予奉命廉访浙西,莅吴中。”(载[明]钱穀辑《吴都文粹续集》卷十四《祠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5册,第342页)《吴都文粹续集》所载当为石刻本,其文末署:“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徐琰撰。”则《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题名记》所云至元三十年正月徐琰“自吴门移治于杭”,似指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先治平江、后迁杭州。

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辖地,《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图考·南台按治三省十道图考》载:“江南浙西道,治杭州、平江、湖州、常州、镇江、建德、嘉兴诸路并松江府、江阴州,置司杭州。”([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田崇点校,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9页)

杭州路,上。^[1]唐初为杭州,后改余杭郡,又仍为杭州。五代钱鏐据两浙,号吴越国。宋高宗南渡,都之,为临安府。^[2]元至元十三年,平江南,立两浙都督府,又改为安抚司。十五年,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3]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来治于杭,改曰江浙行省。^[4]本路户三十六万八千五百,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5]领司二、县八、州一。^[6]

[1] 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四《郡邑类》(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和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癸集卷上《郡邑类》(199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事林广记》,第242页)所载“定夺上下路县”一段公文:

至元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中书礼部奉中书省札付该:来呈补注各处缺员去处,不见上中下路州县三等,有碍铨注,乞照详。得此,都省拟到下项等级体例,合下仰依上承此。

一、路分州县

路 十万之上为上路 十万之下为下路

《元史·百官志》载:“(至元)二十年,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第2316页)与上引公文全同。

至元二十七年杭州路户数达三十六万八千五百,至元十五年改路时当相去不远,故得为上路。

[2] 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载:“建炎三年,翠华巡幸,是年十一月三日,升杭州为临安府。”(《南宋临安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3] 《本证》卷九《证误九》:“案《百官志》七,迁杭州在二十一年,改江浙在二十二年。”(按,《纪》在二十八年)([清]汪辉祖《元史本证》,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77页。括号中按语,为点校者所加。本文引用,标点有所简化)

[4] 《本证》卷二十六《证遗三》:“案《纪》至元十三年二月,立浙东西宣慰司于临安;六月,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临安。二十一年,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志》

有)二十三年,徙江淮行省于扬州。二十四年,复改江浙省为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徙江淮省治杭州。二十八年,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按,《元史》卷九《世祖纪》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卷一三《世祖纪》至元二十一年闰五月,“行御史台自扬州迁于杭州”;二十二年二月,行御史台自杭州徙江州;五月,“行御史台复徙于杭州”。卷一四《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四月,“行御史台自杭州徙建康”,《志》同;十月,“徙浙西按察司治杭州”。卷一六《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九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卷九二《百官志》元统二年正月,置行宣政院于杭州。卷二六《仁宗纪》延祐五年九月,“立行宣政院于杭州”。卷四四《顺帝纪》至正十六年三月,“立行枢密院于杭州”,《百官志》同)(第286—287页)按《本证》与点校者所言皆有据,然相关省名省治变迁颇为剧烈,请参下条辨析。

《地理志》此段叙述,主要涉及两浙都督府、杭州路(安抚司、杭州路总管府)、江淮行省(江浙行省)三事,多有需要辨析之处,《本证》言之而未尽(并补立浙东西宣慰司于临安事,点校者又补立行御史台、行宣政院、行枢密院事),以下分别考述。

第一,两浙都督府问题。

《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三年二月)庚子,行省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都督忙古带、范文虎入城视事。”(第178页)“戊申,立浙东西宣慰司于临安。”(第179页)“(五月)己亥,伯颜请罢两浙宣慰司,以忙古带、范文虎仍行两浙大都督府事,从之。”(第182页)“(六月)壬申,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鄂州、临安。”(第183页)则两浙都督府当作两浙大都督府。又不久设行尚书省于临安。

又《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二年)二月癸卯,大军次安庆府,宋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以城降,伯颜承制授文虎两浙大都督。”(第160—161页)范文虎即设两浙大都督府后之两大都督之一。可知先有两浙大都督之官职,然后有两浙大都督府之设置。

而授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之后,曾设两浙大都督府于平江。洪武《苏州府志》卷一《沿革》载:“元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丞相伯颜至平江,以府治为江淮行省,以提刑司为两浙大都督府,置浙西路军民宣抚司。”(《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32号影明洪武十二年钞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98页)

两浙大都督府所辖,亦可参《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二月)辛丑,伯颜令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左右司官石天麟、杨晦等入城,取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悉罢宋官府,散免侍卫禁军。宋主焘遣其右丞相贾余庆等充祈请使,诣阙请命,右丞相命吴坚、文天祥同行。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等,以宋主焘举国内附,具表称贺。两浙路得府八、州六、军一、县八十一,户二百九十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二,口五百六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第178页)所辖当即北宋之两浙路(南宋之两浙西路与两浙东路),领临安府、绍兴府、平江府、镇江府、湖州、婺州、庆元府、常州、江阴军、瑞安府、台州、处州、衢州、建德府、嘉兴府。(排序据《宋史·地理志》)

第二,杭州路之设置问题。

《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三年二月)戊申,立浙东西宣慰司于临安,以户部尚书麦归、秘书监焦友直为宣慰使,吏部侍郎杨居宽同知宣慰司事,并兼知临安府事。”(第179页)则临安府仍设。

又《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冬十月纪事,有两浙宣抚使、临安府安抚使,(第185、186

页)则《地理志》所载“又改为安抚司”当指临安府改临安府安抚司。

《地理志》此段叙述,先言两浙都督府,后言(临安府)安抚司,前后不伦。

至元十五年改为杭州路总管府,暂未见其他记载。

第三,江淮行省(江浙行省)问题。

此处牵涉元灭南宋后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省名和治所之频繁变迁。《地理志》所述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本证》已经注意及此,并引录了《元史·世祖本纪》的相关记载,只是未作辨析。

江淮行省设置时间,《世祖本纪》无明文,提及江淮行省的最早的纪事则为至元十七年江淮行省左丞夏贵请老事。(第222页)《百官志》则明载:“至元十三年,初置江淮行省,治扬州。”(第2306页)又《元史续编》卷一载:“(至元十三年十二月),置江淮行省。(治扬州)”([明]胡粹中《元史续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4册,第455页)

有关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省名和治所的变迁,《世祖本纪》相关记事如下: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丁未,“(江淮)行中书省自扬州移治杭州”。(第206页)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戊申,“徙江淮行省于杭州。……漳州盗起,命江浙行省调兵进讨”。(第265页)(按此处用“江浙行省”,似说明徙杭州后行省名亦改为江浙行省,然而参照下条纪事,又似乎省名改动尚在下一年十月,似不至一年多的时间省名两度变化)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戊午,“以江淮行省平章忙兀带为江浙省左丞相”。(第280页)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庚午,“江淮行省忙兀带言:‘今置省杭州,两淮、江东诸路财赋军实,皆南输又复北上,不便。扬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且转输无往返之劳。行省徙扬州便。’从之”。(第290—291页)(按上年以江淮行省平章忙兀带为江浙省左丞相,此年则称江淮行省,难道已经改名?参酌下条纪事,似乎此条江淮行省当作江浙行省。同样,不至一年多的时间省名两度变化)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丁亥,“复改江浙省为江淮行省”。(第295页)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癸亥,“徙江淮省治杭州”。(第320页)

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庚辰,“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第353页)

刘如臻《元代江浙行省研究》(载《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5—117页)收集了《元史·世祖本纪》中的记载,并补充说明了《世祖本纪》缺载的至元十二年(当为十五年)至二十一年间的一次江淮行省省治自杭州迁徙扬州的情况。

[5] 有关元代杭州路户口数,可参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七《风土·户口》:

《咸淳志》:主客户叁拾玖万壹千貳百伍拾玖、口壹百貳拾肆万柒百陆拾。

元至元二十七年:户叁拾陆万捌百伍拾、口壹百捌拾叁万肆千柒百壹拾。

皇朝洪武九年:军民匠籍户壹拾玖万叁千肆百捌拾伍、口柒拾贰万伍百陆拾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影明成化刻本,第251页。万历《杭州府志》卷二十八《户口》所载同)

其中南宋末咸淳间户口,同今本咸淳《临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清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3869页);元代户口数,或即据《元史·地理志》。比较这两组数据,可知元军下临安,对其户口数的影响不大,也即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大。

成化《杭州府志》另载至元二十七年杭州路下辖四县户口,亦录于此:

海宁县,“户伍万捌千玖百壹拾柒、口叁拾叁万陆千贰百捌拾贰”。(第253页)

富阳县,“户贰万陆千伍百贰拾、口壹拾肆万壹千壹百贰拾壹”。(第255页)

於潜县,“户玖千陆百贰、口肆万贰千壹百叁拾叁”。(第257页)

昌化县,“户壹万贰千壹拾壹”。(第258页)

[6] 所领二司八县一州,即宋临安府所领之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於潜、新城、盐官、昌化九县。(所列宋代州府军所领诸县状况,包括县名及次序,多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后文不再一一出注)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载南宋初状况(第17页)、南宋末咸淳《临安志》所载均同此九县。

左、右录事司。宋高宗建炎三年,迁都杭州,设九厢。^[1]元至元十四年,分为四隅录事司。^[2]泰定二年,并为左右二录事司。^[3]

[1] 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疆域四·厢界》记在城九厢分别为:宫城厢、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第3540—3541页)

[2] 任士林撰《杭州路重建总管府记》载:“杭为郡自五代迄今,不受兵革之患,故生齿日繁,庐井蚁附,城内外居者无虑数十万家。旧以两县置城西北隅,以听城以外之治;四录事司分置城四隅,以听城以内之治。”([元]任士林《松乡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492页)知四隅录事司之得名系其分置城之四隅之故。此文约撰于大德八年杭州路总管府重建成之时。

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三《公署》:“四隅录事司在府治前。”(第190页)则在一处。

四隅录事司的名称,当分别为东北(隅)、东南(隅)、西南(隅)、西北(隅)录事司。文献中的实例,有山西太原崇善寺藏本《普宁藏》抱腹山印本天字函《大般若经》卷二大德八年印经题记作“杭州路东南录事司如家坊瑞安巷”。(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42页)

[3] 《本证》卷二十六《证遗三》:“案《纪》元统二年,复立杭州四隅录事司。”(第286页)似指由泰定二年之二录事司改为四录事司。

赵汴《江浙省都镇抚哈密公纪功之碑》记至正十三年三月元军进讨徽州红巾,得黟县后,“以杭州路西南隅录事司达噜噶齐伊而苏克为黟县达噜噶齐”,(《东山存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317页。伊而苏克,《全文元》第54册第552页作亦思哈)则可确证二录事司后曾改为四录事司。而四隅录事司之名,当分别为东北隅、东南隅、西南隅、西北隅录事司。文献中的实例,还有至正二十三年管主八之子辇真吃刺将其父所刊二十八函秘密经的经板舍入磻砂延圣寺大藏经坊后,于多字函《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七之末所作刊记谓“杭州路东北录事司安国坊太平巷”。(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295页)

《元史·百官志》载:“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独杭州置四司,后省为左、右两司。”(第2317页)未能全记杭州路录事司的变迁全貌。

县八

钱塘,上。仁和,上。与钱塘分治城下。^[1]余杭,中。临安,中。新城,中。富阳,中。^[2]於潜,

中。^[3]昌化。中。^[4]

[1] 陈基撰《杭州路重修仁和县记》载:“杭属县附郭者二,仁和与钱唐也。仁和在吴越时为钱江县,宋兴国初,始易今名。县故在余杭门之内,绍兴间,县令孙廷直尝徙治招贤坊。其迁丽大府之南左偏,而与钱唐县、四隅录事司并列为东西序,则皇朝大德之际也。”([元]陈基《夷白斋稿》卷三十,《四部丛刊三编》影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钞本,第二叶。)《地理志》所谓“分治城下”,即附郭也。此处谓仁和县、钱唐县衙门与四隅录事司衙门并列,则四隅录事司在一处,同上引成化《杭州府志》。

[2] 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四《郡邑类》(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和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癸集卷上《郡邑类》(199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事林广记》,第242页)所载“定夺上下路县”一段公文:

至元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中书礼部奉中书省札付该:来呈补注各处缺员去处,不见上中下路州县三等,有碍铨注,乞照详。得此,都省拟到下项等级体例,合下仰依上承此。

一、路分州县

路 十万之上为上路 十万之下为下路

州 五万之上为上州 三万之上为中州 二万之下为下州

县 二万之上为上县 万之上为中县 一万之下为下县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载:“(至元)二十年,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江南既平,(至元)二十年,又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至元)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第2316、2317、2318页)与上引公文为一事,知针对南方各县等第而言。不过其中有一处重要的不同,上县《事林广记》作二万以上,而《百官志》作三万以上。从《事林广记》“三万之上为中州,二万之下为下州”不相衔接看,其中的州县两处“二万”似均可修正为“三万”。后文关于诸县等第的讨论,亦均以《元史·百官志》为准。而一些可知户数与等第的实例,也可以说明三万之上为上县。

据前引成化《杭州府志》,至元二十七年富阳县户贰万陆千伍百贰拾,依照《元史·百官志》,当为中县,与《地理志》同。

[3] 据前引成化《杭州府志》,至元二十七年於潜县户玖千陆百贰,当为下县,《地理志》或误。当然,亦有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户数略有变化的可能。

[4] 据前引成化《杭州府志》,至元二十七年昌化县户壹万贰千壹拾壹,当为中县,同《地理志》。

州一

海宁州,中。^[1]唐以来为盐官县。元元贞元年,以户口繁多,升为盐官州。是年,升江南平

阳等县为州,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凡为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2]泰定四年,海圯盐官。^[3]天历二年,改海宁州。海宁东南皆滨巨海,自唐、宋常有水患,大德、延祐间亦尝被其害。^[4]泰定四年春,其害尤甚,^[5]命都水少监张仲仁往治之,沿海三十余里下石囤四十四万三千三百有奇,木柜四百七十余,工役万人。^[6]文宗即位,水势始平,乃罢役,故改曰海宁云。^[7]

[1] 据前引成化《杭州府志》,至元二十七年海宁县户伍万捌千玖百壹拾柒,在五万以上,故得升为中州。

后文关于元贞元年江南诸县升州等第的讨论,均以《地理志》此条注文“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为准。

[2] 有关元贞元年升县为州之事,《元史·成宗本纪》所载(第393页)与《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海宁州条注文全同,均为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合为四十三州。而《地理志》明确记载的元贞元年升州的条目,统计可得中州二十五、下州十七,不过尚有宜兴州可确定为确系元贞元年升为中州者,则可得中州二十六、下州十七。虽然总数相同,但是中州、下州的具体数量却有所不同。但是,元人张伯淳《余干升州记》则云:“皇帝践祚之明年(按即元贞元年),诏江南诸县户口及若干者升为州,中若下凡四十有四,余干其一也。”([元]张伯淳《养蒙文集》卷三,《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钞本,第113页。《全元文》第11册第228页,系据明宣德七年重印元刻本《养蒙先生文集》卷五)四十四州之数,与前述记载不同。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也显示升县为州者的等第与《元史·地理志》有所不同,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东湖《元贞元年江南升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第178页)在张伯淳《余干升州记》所记四十四州的启发下重新分析《地理志》的记载,并肯定了四十四州的说法,但未及解释《元史·成宗本纪》及《地理志》海宁州条注“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出现的原因。(杨晓春《〈元史〉元贞元年升县为州记载辨正》(《文史》2014年第2辑)则通过《事林广记》所载“上县改立州治”一段公文作四十四州(199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事林广记》,第242页),进一步肯定了四十四州这一数据的可取,还就《元史·百官志》中的相关记载作了辨析,并初步解释了《元史·成宗本纪》及《地理志》海宁州条注总体数据的实质与可能的来源。

[3] “泰定四年,海圯盐官”事,《元史·河渠志》“盐官州海塘”条言之详实:“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间,风潮大作,冲捍海小塘,坏州郭四里。”(第1639页)

[4] 大德、延祐间被害事,《元史·河渠志》“盐官州海塘”条载:“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礼部郎中游中顺,泊本省官相视。虚沙复涨,难于施力。至仁宗延祐己未、庚申间,海汛失度,累坏民居,陷地三十余里。”(第1639页)

[5]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载:“(泰定四年正月戊午),盐官州海水溢,坏捍海堤二千余步。”(第676页)也即《地理志》前文所谓“泰定四年,海圯盐官”事。

[6]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载:“(泰定四年四月)癸未,盐官州海水溢,侵地十九里,命都水少监张仲仁及行省官发工匠二万余人,以竹落木栅实石塞之,不止。”(第678页)所载工匠人数与《地理志》不同。另外记载了修治的具体时间为四月,修治结果为“不止”。

泰定四年事,《元史·河渠志》“盐官州海塘”条亦有详细的记载,可以与都水少监张

仲仁事互补:“至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间,风潮大作,冲捍海小塘,坏州郭四里。杭州路言:‘与都水庸田司议,欲于北地筑塘四十余里,而工费浩大,莫若先修咸塘,增其高阔,填塞沟港,且浚深近北备塘濠堑,用桩密钉,庶可护御。’江浙省准下本路修治。都水庸田司又言:‘宜速差丁夫,当水入冲堵闭,其不敷工役,于仁和、钱塘及嘉兴附近州县诸色人户内斟酌差倩,即日沦没不已,旦夕诚为可虑。’工部议:‘海岸崩摧重事也,宜移文江浙行省,督催庸田使司、盐运司及有司发丁夫修治,毋致侵犯城郭,贻害居民。’五月五日,平章秃满迭儿、茶乃、史参政等奏:‘江浙省四月内,潮水冲破盐官州海岸,令庸田司官征夫修堵,又令僧人诵经,复差人令天师致祭。臣等集议,世祖时海岸尝崩,遣使命天师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颜奉御香,令天师依前例祈祀。’制曰‘可’。既而杭州路又言:‘八月以来,秋潮汹涌,水势愈大,见筑沙地塘岸,东西八十余步,造木柜石囤以塞其要处。本省左丞相脱欢等议,安置石囤四千九百六十,抵御蝟蝟,以救其急,拟比浙江立石塘,可为久远。计工物,用钞七十九万四千余锭,粮四万六千三百余石,接续兴修。’”(第1639—1640页)

下石囤、木柜之法,可参有关浙西海塘修筑的技术研究,如郑肇经、查一民《江浙潮灾与海塘结构技术演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称“石囤和木柜可用作塘基和塘身,亦可护坦,柜外钉关柜木桩,防止潮流卷拔。石囤木柜塘的结构与吴越钱氏的竹笼木桩塘大致相似,木桩(疑为柜之误)比竹笼坚固稳定,但造价较高”。

[7] 文宗时盐官州海塘事,《元史·河渠志》“盐官州海塘”条亦有更详实的记载:“文宗天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当大汛,潮势不高,风平水稳。十四日,祈请天妃入庙,自本州岛岳庙东海北护岸鳞鳞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涨,东西长七里余,南北广或三十步、或数十百步,渐见南北相接。西至石囤,已及五都,修筑捍海塘与盐塘相连,直抵岩门,障御石囤。东至十一都六十里塘,东至东大尖山嘉兴、平湖三路所修处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西自六都仁和县界赭山、雷山为首,添涨沙涂,已过五都四都,盐官州廊东西二都,沙土流行,水势俱浅。二十日,复巡视自东至西岸脚涨沙,比之八月十七日渐增高阔。二十七日至九月四日大汛,本州岛岳庙东西,水势俱浅,涨沙东过钱家桥海岸,元下石囤木植,并无颓圯,水息民安。’于是改盐官州曰海宁州。”(第1641页)具体地说明了“水势渐平”的情况。

湖州路,上。唐改吴兴郡,又改湖州。宋改安吉州。^[1]至元十三年,升湖州路。^[2]户二十五万四千三百四十五。抄籍户口数阙,用至顺钱粮数。^[3]领司一、县五、州一。^[4]

[1] 《宋史·地理志》载:“宝庆元年,改安吉州。”(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175页)《永乐大典》册二一卷二二七五页十三引《吴兴续志》:“宝庆元年,改安吉州。”(马蓉、陈抗、钟文、栾贵明、张忱石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708页)《宋史地理志汇释》引《宋史地理志考异》、《〈宋史·地理志〉补正》,据《舆地纪胜》、《宋史·理宗纪》等均以为当作宝庆二年。(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2] 万历《湖州府志》卷一《郡建》载:“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改安吉州为湖州路按抚司,仍置安吉县。十四年,改湖州路达鲁花赤总管府。……隶浙江行省。”(《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史部第 191 册影明万历刻本,第 16 页)按抚司当作安抚司,浙江行省当作江浙行省。然可知《地理志》所述不够全面。

《永乐大典》册二一卷二二七五页十三引《吴兴续志》:“至正十六年,高邮张士诚窃据,改吴兴郡,仅得德清、武康、乌程、归安四县之地,罢录事司,以西南厢隶乌程。东北厢隶归安。至正十七年,归于元,仍复湖州路总管府,而录事司不复再设。丙午年,守将以城归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 2 册,第 708 页)万历《湖州府志》卷一《郡建》载:“(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湖州四县之地:乌程、归安、武康、德清,易号吴兴郡,以其党潘原明镇之。”(第 16 页)可补元末沿革状况。

[3] 元代湖州路户口,可参《永乐大典》册二一卷二二七七页二引《吴兴续志》:“元至元二十七年,籍户得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二十八,南人户二十五万四千三百四十五,北人户一千四百九十三户。”《吴兴续志》并详载所属乌程、归安、长兴、武康、德清、安吉六县至元二十七年户数,(《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 2 册,第 744—748 页)列表如下:

	户数	南人户数	北人户数
乌程县	68437	68341	96
归安县	49894	49866	28
长兴县	54151	54048	103
武康县	17261	17220	41
德清县	31465	31389	76
安吉县	25298	25246	52
合 计	246506	246110	396

以上六县的数据,统计结果与《吴兴续志》所载总数不同,当是另有录事司户口未计入的缘故。

有关元代湖州路户口数,还可参成化《湖州府志》卷八《户口》:

淳熙九年,主客户二十万六百六户、口五十五万九千七百五十二口,客户三千九百八十八户、口一万二千六十口。

至元二十七年,湖州路南北人户二十三万六千五百七十七。

国朝洪武二十四年本府所辖乌程等县计户二十万四十八、口八十一万二百四十四。(《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明成化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99 页)

万历《湖州府志》卷五《户口》所载同。(第 98 页)成化《湖州府志》还记载下辖乌程、归安、长兴、安吉、武康五县总户数及南北人户数的具体数据。(德清县原阙)不过与明初《吴兴续志》所载户数亦有所不同。

按《地理志》所记户口数,多注明为“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此处湖州路注“抄籍户口数阙”,《吴兴续志》、成化《湖州府志》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数恰可作补充。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 3 卷《辽宋金元时期》引《永乐大典》所引《吴兴续志》的数据和雍正《浙江通志》引嘉靖通志的南北人户 236577。对于两种数据的差异,认为《吴兴续志》可能包括军户和匠户故而户数较多。另外还据松江府的事例(即至顺钱粮户数只是纳

税户,不是全部户数)指出,湖州路的至顺钱粮户可能也没有将某种人户计算在内;还指出:“《吴兴续志》提到‘皇朝抄籍六县军户民户之数’,共得户 220256,口 929253。如果可以将明初的抄籍数理解成元朝末年的数字,则此两个数字是湖州路的元末户口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18 页)按雍正《浙江通志》的数据同前引成化《湖州府志》。

[4] 所领一司五县一州,即宋安吉州所领之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武康六县。

录事司。旧设东、西、南、北四厢。^[1]至元十三年,立总督四厢。十四年,改录事司。^[2]

[1] 据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四厢为:左一厢、左二厢、右一厢、右二厢。(《宋元方志丛刊》第 5 册影民国三年《吴兴丛书》本,第 4689 页)

[2] 万历《湖州府志》卷一《郡建》载:“(至元)十四年,改湖州路达鲁花赤总管府。……以郭内四厢之地置录事司。”(第 16 页)即《地理志》“十四年,改录事司”事。崇祯《吴兴备志》卷十九《战守征》载:“元平江南,以禁厢八营并为四,领以录事司,隶江浙行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4 册,第 486 页。)似即《地理志》“至元十三年,立总督四厢”事。

又万历《湖州府志》卷一《郡建》载:“(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湖州四县之地:乌程、归安、武康、德清,易号吴兴郡,以其党潘原明镇之。罢录事司,四厢分属乌程、归安二县。”(第 16 页)崇祯《吴兴备志》卷十九《战守征》载:“伪吴罢录事司,以禁厢分属二县:乌程、归安。”(第 486 页)可补元末沿革状况。

县五

乌程,上。归安,上。与乌程皆为倚郭。安吉,中。德清,中。武康,中。^[1]

[1] 《永乐大典》册二一卷二二七五页十三引《吴兴续志》:“元贞元年,升长兴为州,以乌程、归安为上县,德清、安吉为中县,武康为下县,长兴为中州。”(《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 2 册,第 709 页)其中武康县等第与《地理志》不同。

前文杭州路条注,已指出《事林广记》引至元二十年公文节文和《元史·百官志》关于至元二十年诸县等地的户数标准略有不同,肯定了《百官志》三万之上为上县的记载。

然而前引《永乐大典》引《吴兴续志》载至元二十七年湖州路各县户数,德清超过三万,当作上县,而《地理志》作中县。不相吻合。

州一

长兴州,中。^[1]唐为绥州,又更名雒州,又为长城县。朱梁改曰长兴。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为州。^[2]

[1] 据前引《永乐大典》引《吴兴续志》,长兴县户数在五万以上,故元贞元年升州时得为中州。

[2] 万历《湖州府志》卷一《郡建》载:“成宗元贞二年,升长兴为州。”(第 16 页)

嘉兴路,^[1]上。唐为嘉兴县。石晋置秀州。宋为嘉禾郡,^[2]又升嘉兴府。^[3]户四十二万六千六百五十六,口二百二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二。^[4]领司一、县一、州二。^[5]

[1] “嘉兴”,元刻本《元典章》作“加兴”。按作“加兴”,当为俗写。嘉兴得名,《至元嘉禾志》卷一《沿革》云:“宁宗庆元元年,以是郡为孝宗毓圣之地,升为嘉兴府。”([元]单庆修、徐硕纂,嘉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校《至元嘉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 《考异》卷八十九《元史四》:“案:秀州吴越王钱元瓘置,宋亦为秀州,兼立嘉禾郡名,非改州为郡也。”([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43页)

[3] 《本证》卷九《证误九》:“案失书元升路事。”(第77页)

查《至元嘉禾志》卷一《沿革》载:“圣朝至元十三年正月,改为嘉兴府安抚司。至元十四年三月,改为嘉兴路总管府,领府一、县三、司一。录事司,城以内隶焉。”(第1页)

[4] 《地理志》所载户口数未说明时代。《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载至元后期嘉兴路及所辖司、府、县户数如下:

嘉兴路,“四十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七户”。

录事司,“六千五百八十户”。

松江府,“二十三万四千四百七十户”。

嘉兴县,“一十二万七千四百十二户”。

海盐县,“四万二千二百五户”。

崇德县,“五万五千四百户”。(第47—48页)

又弘治《嘉兴府志》卷二《户口》载:“元,户四十二万六千五十六户,口二百二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二口。国朝洪武间,户三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户,口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一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9册影上海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第24页)所载元代户口数与《地理志》几乎完全相同,或系因袭《地理志》而来。

另一版本弘治《嘉兴府志》卷五《户口》载:“大明洪武初年,本府户叁拾贰万柒千伍百叁拾贰户、口壹佰壹拾壹万贰千壹佰贰拾壹口。”(《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05号影明万历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243页)未载元代户口数。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认为《地理志》所载为至元二十七年的数据。并引《至元嘉禾志》,认为《地理志》的数据包括了划出去的松江府的户口数,如果将松江府户数扣除,则嘉兴路只有224927户。又指出《至元嘉禾志》所载户口数显然系转抄南宋末年的数字,因此探讨至元二十七年嘉兴路的户口还需加上南宋末年以来十余年的人口自然增长,估计该年约有户24万左右。(第318—319页)

[5] 所领一司一县二州,即宋嘉兴府所领之嘉兴、海盐、崇德三县。

录事司。旧置厢官,元初改为兵马司。至元十四年,置录事司。^[1]

[1] 《至元嘉禾志》卷一《沿革》载:“宋置南、北、西三厢。圣朝至元十三年废,遂置兵马司。至元十四年,改为录事司。”(第1页)按兵马司仍为宋代旧制,为兵马铃辖司之简称。